
卷十七 人物

一 人物传

杨孟东

杨孟东（1916～2009），男，美籍华人，英文名叫理查德·杨，原中国电力制钢厂（今安宁桥钢）首任炼钢工程师，也是昆钢第一位炼钢工程师。

1916年12月，杨孟东出生在美国夏威夷。其叔父杨仙逸即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中国飞机制造厂厂长，曾领导组装出中国第一架飞机“洛士文”号，被誉为“中国空军之父”。杨仙逸的爱国思想深为孙中山、宋庆龄赏识；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少年时代的杨孟东，使他从小就立下“工业救国”的志向。高中毕业后，杨孟东以优异成绩从家乡夏威夷考入科罗拉多大学，主攻钢铁专业。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很快被日寇占领了大部。设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工业研究所只得避难于法租界。该所主要对钢铁、陶瓷、玻璃、纺织等工业项目进行科学研究，并推广运用新技术。所长周仁原系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冶金硕士，对钢铁冶金行业特别重视，曾出版过不少研究专著。由于时局恶化，周仁准备将工业研究所迁往云南。于是，他派研究员马光辰先期赴滇了解情况，自己则将研究所迁到香港等候消息。马光辰到滇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指派缪云台与马光辰洽谈。缪云台对研究所迁滇颇感兴趣，认为此举可改变云南工业落后面貌。缪云台报请龙云批准后，决定由云南省出资帮助工业研究所迁滇。周仁在香港闻讯大喜，但又担心研究人员已大量流失，人才匮乏。此时，他刚巧从报纸上获悉前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香港治病的消息，便去找蔡元培帮忙。原来，蔡元培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周仁的顶头上司，且与宋庆龄过从甚密，也了解杨仙逸的侄子杨孟东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主攻钢铁专业。于是，经蔡元培推荐，周仁决定聘请杨孟东毕业后回国赴滇共同发展云南钢铁工业。

1939年2月22日，中国电力制钢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国际联欢社成立，推选缪云台为董事长，聘请周仁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马光辰为副总工程师。次日，周仁即由重庆返回昆明，着手工厂建设，经多方比较，征求意见，最后将中国电力制钢厂厂址选定在安宁县的桥头村。在建厂过程中，周仁接到蔡元培的电报，告知杨孟东即将在美国毕业，已答应来中国工作。周仁立即向杨孟东下了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电力制钢厂炼钢工程师，“着即上任”，在电炉建成前，先行主持炼钢车间建设工作。7月，杨孟东终于从美国来到安宁县桥头村中国电力制钢厂。他一到任，就开始进行炼钢设备的选用工作，结果发现，当时国内的

炼钢设备相当落后，还远远不如美国淘汰的产品。他就向周仁建议，与其从南京、上海等地往昆明辗转运输落后设备，不如直接向国外购买适合中国用的更先进的设备。周仁经过测算，觉得这一建议可行，遂委托杨孟东办理此事。杨孟东立即向美国钢铁联合会发出电报，很快就得到回答：美国钢城匹兹堡有一家钢铁公司扩容，可将一座 1934 年产的 0.5t 电炉以废钢价格转让给中国电力制钢厂。这座电炉不仅很适合中国电力制钢厂，且价格远远低于预算，运回国内几乎不用作多大改造就能投产。周仁征得董事会同意后，即委派杨孟东返回美国，商洽订购电炉事宜。

1940 年初，正当杨孟东在美国争分夺秒把匹兹堡电炉拆除完毕准备装运回国时，日寇侵略中国的战争再度升级。他们瞄准滇越铁路，妄图从此路进犯昆明。迫于形势，中国主动将滇越铁路的河口大桥炸毁，并沿昆明方向拆除 170 多公里铁路，以阻断日寇进攻。滇越铁路一中断，杨孟东押运的匹兹堡电炉只好改由缅甸仰光码头卸货，装火车运往缅甸掸邦北部重镇腊戍，再改用汽车沿滇缅公路运回中国电力制钢厂。为适应汽车运输，匹兹堡电炉不得不在腊戍进行第二次解体。负责二次解体的，依然是杨孟东。当时汽车稀少，匹兹堡电炉化整为零后，有车就运，前前后后经历了一年时间，历尽种种困难，终于在 1941 年 5 月完整地运抵中国电力制钢厂；同时运回的还有瑞士制造的水冷式变压器和其他国内设备。在不断找车运输电炉设备的过程中，电力制钢厂每接到一辆车，就立即组织安装，如有不懂之处，杨孟东就随下一辆车回安宁指导，然后又返回腊戍继续找车装运设备。如此，当最后一辆车运抵安宁时，这座匹兹堡电炉也安装得差不多了。

1941 年 6 月 9 日，中国电力制钢厂第一座电炉（即桥钢现已报废的 1 号电炉）安装竣工。8 月 28 日，匹兹堡电炉炼出第一炉钢水，浇注在 9 个 4.5 英寸的钢锭里。此后，杨孟东又和技术人员对电炉进行了几次调试，可惜没等到电炉正式投产就离开了中国电力制钢厂。按照美国《兵役法》，24 岁的杨孟东必须回美国服兵役。9 月，杨孟东辞去中国电力制钢厂炼钢工程师职务。11 月，匹兹堡电炉正式投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将军出任中缅印远征军总司令，当得知杨孟东在中国的经历后，便把他征调到远征军，出任上校副官。

1942 年 2 月，杨孟东以军人身份再度来到云南，虽在滇缅公路上来来往往经过电力制钢厂无数次，终因戎马倥偬，军令在身，无暇进去一走。6 月，史迪威偕杨孟东到重庆参加军事会议时，宋庆龄设宴招待。当宋庆龄得知杨孟东的叔父是杨仙逸时，特意把他叫到面前，详细询问了他的居住地、年龄和其他情况，并叫杨孟东称她为 Aunt（译成中文即阿姨、婶婶之意）。杨孟东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时说：“当时在场的还有冯玉祥、商震等高级将领，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上校副官。可是，宋庆龄先生和我说的话最多。我完全被这位举世闻名的女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者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重庆会议之后，史迪威和杨孟东又回到中缅印战场。后来，廖承志的女儿廖梦醒曾回忆了一件往事：1942 年，也就是重庆会议之后，宋庆龄要廖梦醒找找杨孟东上校，通过他见到史迪威将军，请其帮忙把一台大型 X 光机送给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此事办得很成功，宋庆龄、周恩来都很高兴。

1944 年，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战场，杨孟东也随他回到美国。1946 年，杨孟东从美军退役后，到联合国救济总署驻上海中国办事处工作，从事工业调查和救援方面的事务。这段时间，他常常得到宋庆龄的帮助和关怀，也能利用职务之便，向解放区送一些药品和军需物资。1948 年，联合国救济总署驻上海办事处撤销，杨孟东回到美国，这一去就将近 30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宋庆龄邀请杨孟东回中国看看。杨孟东欣然应允。此时，他已经是美国伊沈公司副总裁了。当他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时，心里非常高兴。1979年，杨孟东在北京农展馆附近盖了一座现代化的五星级国际大饭店，取名为“万里长城饭店”，后经宋庆龄建议，改为“长城饭店”。这个饭店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外资饭店，也是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星级饭店。杨孟东把此当作他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与世长辞。杨孟东亲往中国悼唁，向宋庆龄遗体告别。

1985年，在纪念战胜法西斯胜利40周年之际，杨孟东与其他远征军幸存者一道，组织了一次重走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的活动。5月下旬的一个上午，3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驶进安宁县境内的桥钢。那个年代，这么高级的轿车驶入桥钢还是件稀奇事。这不能不引起许多员工和家属的好奇。但这些轿车的主人既没有到厂部找厂长、书记，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而是将轿车停到路边，下车径直朝炼钢车间而去。在报废的1号电炉旁，一位年近七旬的高个子中国人，用纯正的美国英语，向同伴们介绍着这座电炉的兴衰。他，就是杨孟东，在圆一个40多年的梦。

2009年1月26日，杨孟东在美国帕洛阿尔托市去世，享年93岁。

袁应标

袁应标（1893~1973），男，汉族，安宁县连然镇马料河村人。

袁应标之父袁镛系清朝例赠登仕郎，与原配夫人张氏生有五子：袁应梧、袁应栏、袁应标、袁应桢、袁应梅；后与本县沙木邑村李罗氏婚后又生一女，名袁洪珍。袁镛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并有著述，留传下来的有《声律发蒙》。他还收集和保存了近千册孤本、善本书籍和许多楹联字画等。至今，他请滇西杨汝勳为自己和夫人作的画像，虽历经百年仍保存完好。袁镛教子有方。长子袁应梧、三子袁应标，都在不同领域为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

袁应梧清朝末年毕业于省立速成师范学校，后经考试录取到日本留学，因家庭拮据未能成行。1913年，袁应梧受聘安宁县东界龙宝义学改办的新制小学，担任校长兼教员。民国伊始，新制初创，袁应梧根据实际情况，把学生编成甲、乙、丙三班，主科为国文、算术，其他科目有修身、史地、图画、唱歌、体操等。他每周要上六天课，每课一小时，一年忙到头，只有腊月三十才能回家与亲人过个年。在全县教师考评中，袁应梧被县教育部门授予“以校为家”荣誉称号。后来任安宁县督学的张其善，当时即为袁应梧的学生。1986年，时任安宁县政协常委的张其善还念念不忘与袁应梧的师生之情，撰写了一篇题为《袁应梧老师》的回忆文章，载于《安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上。不幸的是，袁应梧英年早逝。1922年，由于家境困难已辞职回乡务农的袁应梧染上伤寒病，包括父亲袁镛、四弟袁应桢等8人，皆因此病相继去世。袁应梧时年36岁，留下遗孀和三女一男艰难度日。

袁应标系袁镛第三子。1913年，袁镛从云南府衙稿公解职回家后，由于家境贫困，人口众多，只读完小学的袁应标便入赘昆明珠玑街项家，与其长女成婚。1916年11月5日，袁应标应聘到耀龙电力公司。1922年的一天，袁应标在为云南省都督唐继尧安装电灯时不慎摔伤。唐继尧对他十分关心，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袁应标告之了他家8人因染上伤寒病相继去世的惨状，说老家现在只剩下大嫂和五弟了，急需他回去支撑家